「超低門檻」泛民可派二人選特首

沈家聰

點擊香江

政改次輪諮詢文件公布後，反對派「撐黃傘」離席，同時宣稱不僅會「杯葛」諮詢，更會「毫不猶豫」地否決方案。反對派的心情其實可以理解，在「佔中」慘敗之後要拉下臉面殊爲不易。但是，就算不從市民利益角度去想，從反對派本身的利益而言，參與諮詢並積極考慮支持未來的方案，實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最少在三方面有益：一，反對派陣營可最少派出二人參選特首，開創歷史；二，特首選舉本身就是一場選民大動員，對政黨議會選舉乃至長遠發展必有所益；三，最有效地利用「佔中」遺產，鞏固自身民意支持。

「入閘」選特首可壯大力量

政治就算不全都是「妥協」，但至少，沒有妥協也就無法成就共識，沒有共識何談民主制度？當前香港面臨的是嚴重對立的社會氣氛，而在特首選舉這類政改問題上，又必須遵從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這就意味着，如果一味對立，最終也只會兩敗俱傷。事實上，諸如「佔中」這類極端運動都做過、最終也無法獲得勝算，那麼反對派是否應當仔細想一想更長遠的運動策略？

諮詢文件最引人注目，也可以說是最大的亮點在於，建議大幅降低入閘門檻，由現行的選舉委員會八分之一、150票，減少至十二分之一、100票即可入閘，成爲特首選舉的準候選人。這對整個反對派而言，不僅僅是數字的增減，而是更加多的機會。

回歸17年來，共有四次特首選舉，反對派直接或間接參加過其中的三次。2005年特首補選時，民主黨的李永達作爲反對派的代表宣布參選，最終他只在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中，獲得50張提名，達不到100的門檻，而無法入閘；到了2007年，反對派的代表換成了公民黨的梁家傑，最終他得到132張選委的提名，成功入閘，更在電視上與曾蔭權展開電視辯論；2012年，民主黨何俊仁代表反對派參選，在由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中，他總共獲得188張選委提名，超過了最少要150張提名的門檻，成功入閘。這三次參選機會，是反對派難得政治表演機會。

如果按照諮詢文件所建議的，門檻降到十二分之一，那麼，以反對派的實力，最少可以「保送」兩名候選人入閘。例如，在2011年的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上，反對派共獲得173席，再加上當然席位等，總共有最少205張選委票。參照這一「基準」，反對派如果希望在2017年參選，內部配票之下，何俊仁、梁家傑都可以順利入閘。

可能有人會問，即使有二人入閘，也改變不了結果，反對派更可能分薄票源反而便宜了建制派。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結果，但不應小看有兩名反對派候選人入閘的歷史性機遇。試想，如果在提委會選舉期間，最多六人競選情況下（假設每人最多不能獲得超過200提名票），反對派有兩人，但建制派卻有三到四人，結果可能是建制派內部分薄票源的可能性更加大。而通過公開的競選平台，反對派準候選人可以相互配合，發揮前所未見的巨大的政治能量，最終出閘也並非完全沒有機會。

事實上，每一次的特首選舉，都是一次巨大的群衆、選民的宣傳動員，對政黨的議會選舉乃至長遠發展都是極其重要的。過去不過是1200名選民，未來則是多達500萬選民，對反對派而言，可操作空間將是「無限可能」。反對派不是憂慮不知如何善用「佔中」遺產嗎？還有什麼比將市民支持換成選票支持更加實際、更加有效的？

普選踏出第一步仍可再完善

即使不考慮大多數市民的利益與感受，從反對派自身利益來說，參與諮詢、支持政改通過，也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更何況，實現2017普選，不會是一個終極方案，未來還有充分的空間與機會繼續推動普選制度。一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去年九月一日所說，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中，關於制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這基本原則沒有改，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規定的政改「五步曲」程序也都還存在。

因此，2017年的普選方案不是終局方案。只要我們能成功踏出普選這一步，普選制度便會在香港植根，而制度下的細節便可因應社會情況的變化而不斷完善。

2017年將會是香港首次有機會行使基本法所賦予的投票權，「一人一票」選出下一任行政長官。機會觸手可及，不應該如此意氣用事，說杯葛就杯葛。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昨日亦在聲明中呼籲，香港政制發展已走到關鍵一刻，需要全港市民參與，編寫民主發展歷史性一頁，若反對派拒絕參與，是一大遺憾。他並認爲，反對派應該將眼光放遠，讓香港市民在2017年有機會用手上一票選出特首，有得選肯定比沒有機會投票好。

如果2017年實現普選，反對派有兩位準候選人進入競選平台，與其他數名建制派準候選人同台辯論，誰又擔保建制派候選人表現一定會好過反對派？而反對派就一定沒有機會？如果眞的這麼以爲，未免太不相信自己的實力了。

冀政改多聽青年聲音
陳佐洱：教育缺失須深思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周四在京表示，香港特區成立以來，相當一部分香港青少年缺乏國家民族意識、公民意識、人生理想目標，以及在中國地理、歷史、文化等方面知識存在很大缺失。「一國兩制」之下，未來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需要與港發展大勢相銜接的教育理念來支撐。他希望在第二輪政改諮詢中多傾聽青年聲音，也相信香港廣大青年公民會積極理性地加入到此輪政改諮詢中。

【大公報記者賈磊、江哲北京八日電】

陳佐洱在該會舉辦的香港專題研討會上發言表示，青少年是國家、香港特區及千家萬戶的明天，全社會都關注着他們的成長。香港特區成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少年依然聰明、好學、熱情、天眞，這是港澳研究會所有會員的共識。不過陳佐洱直言，事實說明，香港教育領域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的問題。

他指出，教育領域包括教育行政當局、各種背景的辦學團體、校董會、從事人文社會教學的師資素質，以及已走進校門的一大批社工。這些力量長年累月在教育領域工作的積累，在非法「佔中」活動中得到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檢驗，「哪些是甜瓜、甜豆，哪些是苦瓜、毒豆，不必細品，已經了然」，陳佐洱說，這是值得深刻反思。

陳佐洱表示，港澳研究會的研究發現，學界、教育界對教育局局長及其行政團隊的要求和希望是很迫切的。正如去年六月十日國務院發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指出，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在「一國兩制」之下，所有治港者肩負着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冀教育當局培養合格公民

「當我們在制定每一項政策，推出每一項措施，比如課程設置、學校管理時，是否從香港實際出發，考慮到與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利弊得失呢？是否考慮到與基本法規定，和長期繁榮穩定的利弊得失呢？」陳佐洱說，根據基本法第48條和第104條，教育局局長與其他經中央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員一樣，應牢記和踐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誓言的，並隨時接受爲有實質任命權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監督的。

陳佐洱說，他和港澳研究會同仁相信，香港特區教育局局長和教育行政當局會身體力行，用好手中的龐大資源，正確指導辦學團體、諮詢機構和各級各類教育工作者一道，忠誠於爲「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社會培養合格公民繼承人、建設者和創造的神聖事業，這也是國家、特區和千家萬戶爲了下一代的未來前程對教育領域的深切期盼和重託。

「爲什麼非法『佔中』期間香港教育領域亂象叢生？爲什麼香港回歸時才哇哇學語的娃娃，現在有人成了維護米字旗，衝擊軍營、立法會和政府總部的排頭兵」，陳佐洱稱，「這是不是與當局一段時間以來秉持的教育理念，與貫徹實施中國憲法、「『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有不銜接的情況？除學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傳媒教育又做得怎樣呢？」

陳佐洱引述研究會會員發言表示，青少年是朋友、未來和希望，而不是對手。正因爲這樣，對溝通青少年的主渠道即教育的期盼和要求是那麼迫切，期盼和要求通過教育施以更多的陽光雨露，鬆土鋤草除害蟲，讓新苗茁壯成長。

反思青少年洗腦後怎補腦

陳佐洱以一位內地教師的身份，希望香港特區教育行政當局和廣大師生員工振奮起來，有使命感的同時要有危機感。既然青年是香港的未來，關心香港未來的政治體制的發展，在第二輪政改諮詢期應當多傾聽青年的聲音，他同時相信廣大香港的青年公民會積極理性地加入到此次政改諮詢當中去。

陳佐洱認爲，「中國香港夢理應是美麗中國夢的一部分，正在構築迎接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香港夢，一個爲青少年創造美好未來的中國香港夢？這是香港青少年一代，教育領域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陳佐洱指出，很多研究會中的香港學者會員表示，「佔中」之後任重道遠，需要深刻反思，大亂而後大治，圍繞爭奪香港管制權的較量是長期的反覆的，遠沒有結束，不可高枕無憂、得過且過。教育領域的缺失如何來彌補，青少年一代在洗腦後怎麼補腦，香港社會和所有研究「一國兩制」的專家學者都在關注和思考。

▲陳佐洱指出，香港應反思「佔中」後怎樣為被洗腦的青少年補腦　本報記者賈磊攝

何志平：用青年語言加強溝通

【大公報記者賈磊、江哲北京八日電】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表示，如何對待香港的青少年需要重新檢討和調整方向，成年人應加強與青年之間的溝通，「用他們的語言去說一點他們聽得懂的話，我們現在沒有做到這一點」。

何志平表示，目前香港青年主要面臨以下問題：一是全球化影響下，青少年的意識形態及發展空間都受到影響，包括後現代主義，互聯網的崛起和應用，人才流動性、競爭性的加強及事業困難、對前途看不準所帶來的不安，這些都是全球化下一般性的問題；二是香港回歸後，內地經濟發展特別快，香港對內地之間的關係有所轉變。回歸初期香港的GDP約佔全國GDP的16%，到今天17年後香港的GDP佔全國GDP的2%，這令很多有大香港心態的人感到不是味兒，也很難適應；三是港人身份的轉變。從殖民地的子民變成中國的公民、香港的主人，這種身份的改變很多人沒有覺醒過來，調整過來。香港青年怎麼以香港的主人翁身份出現，是需要重新調整的一個方向；四是香港的青少年對未來的期待看不準、看不清，看不到將來要追尋的是什麼東西，對未來有一些恐懼，一些迷惘。要破舊，但不知道立什麼新的東西，有一種要幹一點事的心態。

用他們的語言說聽得懂的

何志平表示，以舊一代人的期望強加於新一代人的身上，新一代人未必認同，造成兩代人間的落差。他分析認爲，對國家的認同並非一蹴而就，不能進入他們個人的世界，不能用他們的語言說他們聽得懂的說話是不起作用的。青少年工作分成不同的階段，最重要是通過接觸進入他們的世界，與他們一起工作、成爲朋友，不是師長與學生的關係，而是朋友、同輩的關係。此外，社會要針對青年的需要，提供適切的環境、培育和支持，令他們能有效地滿足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又能滿足他們對社會的期望。

何志平表示，「佔中」事件讓沉默的大多數市民了解到，香港人需要站出來發聲，重新審視自身的政治、文化的身份，重塑核心價值，社會矛盾雖然爆發了，但這是香港人最重要的一場國民教育，讓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可以自我警醒。「佔中」是給港人一個機遇，要面對身份轉變的問題，並要爲香港青年及下一代清除殖民政府遺留的一切有關身份認同的障礙。

部分青年心態以違法為榮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副校長鄧飛也表示，香港部分青年的心態發生了三個質的變化。一是政治道德的自我崇高化；二是從以前懷疑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到對廣義上的中國歷史文化底蘊的不認同；三是從尊重法治到以違法爲榮。

鄧飛指出，必須要有一個應用式的智庫研究，很多問題不能憑印象去幹，要系統地研究香港青年人的社交語言和思維習慣，用青年人聽得懂且認同的語言去重構教育工作。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學院長陳周旺則認爲，主流社會組織青年教育是自上而下的，只關心精英，很少會關注弱勢群體。他建議在青年工作中，把「精英化」的思維變成「底層化」、「草根化」的思維，眞正地去關心弱勢群體。

▲何志平認為要加強和青少年溝通，用他們的語言說他們聽得懂的話　本報記者賈磊攝

▲全國港澳研討會在北京舉辦香港專題研討會　本報記者賈磊攝

學者倡參與建設認識國家

【大公報記者江哲北京八日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在研討會上表示，香港青年問題的本質是對國家的認同危機。「我們的目的是要治病救人，而不是要去譴責、責罰」，他指出，香港青年在經歷「佔中」後應該學會獨立思考。陳端洪建議國家應該創造更多機會吸引港青參與國家建設，包括公務員和自願服兵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建議讓青少年參加國家建設，增強對國家認識　本報記者賈磊攝

陳端洪表示，香港青年面臨就業壓力、生存空間等問題，但這不足以把香港青年問題化，導致將其作爲問題來對待的，實際是對普選的整體焦慮。香港青年問題的本質是對國家的認同危機，國家認同包括國土河山、民族、傳統文化及政治共同體等多個層面，香港青年缺乏對這些層面的認同。

從參與「佔中」活動的香港青年的言論和政治主張來看，他們對基本法有關規定和「8・31」決定完全不認同，其本質是不認同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還有少數人不接受香港回歸的既定政治事實，基於這方面的客觀理由，才把香港的青年問題化。「我把他們比喻爲政治上的無家可歸者」，陳端洪說，「佔中」者露宿街頭就是「無家可歸」的一種傾向。

建議讓港青參軍當公務員

陳端洪指出，香港青年人在經歷「佔中」這種精神遊蕩之後，應該學會獨立思考。而中華民族整體應該對這一代人負責，對他們要特別的關愛。在成長的關鍵時期，他們就趕上了普選的歷史機遇，又屬於青春的年齡，所以成年人要用十二分的寬容和耐心來幫助他們成長。國家應該創造更多機會吸引香港青年參與國家建設，包括公務員和自願服兵役，只有參與到國家建設來才能產生休戚與共的情感。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陳欣新表示，香港青年的教育問題要以溝通爲前提。目前，香港青年與成年人之間，香港青年與特區政府之間、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溝通都存在問題。他建議香港與內地間的溝通和交流更多從青年人開始。

「兩岸四地之間的年輕人之間的溝通和理解能夠到什麼程度，影響的不是現在，而是影響20年、30年，甚至50年之後」。陳欣新說，如果能夠創造一些機會，讓他們更多的、全面的去了解彼此，很多問題就會得到緩解。這個過程不是簡單到內地求學、到香港念書，或者是組織幾個交流團，這些作用很有限，怎麼去做是需要大家共同去想的事情。

陳欣新指出，「佔中」結束對很多支持「佔中」的青年人來說是很大的挫折，愈在這個時候愈需要有人去關心他們。年輕人的聲音不應該只發生在「佔中」的現場，他們離開了那個非法佔領地以後，恰恰是通過正常的、合法的途徑去傾聽他們聲音最好的時機。